

1955年赫鲁晓夫访南及其影响

李 华

(南通师范学院历史系,江苏 南通 226007)

作者简介 李 华(1962-),男,江苏南通市人,南通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世界现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是战后苏南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广泛深远。首先,赫氏访南对苏、南双方均具有重要政治经济意义;其次,赫氏访南萌生了对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多样性的认识;第三,赫氏访南导致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独立意识的增强。

关键词 1955年 赫鲁晓夫 南斯拉夫 铁托

中图分类号 K 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4-0105-06

1955年夏天,赫鲁晓夫为弥合斯大林在1948年开除铁托而破坏了的两国关系,到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赫鲁晓夫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露面,也是当年“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①本文拟着重就赫鲁晓夫访南背景与影响问题作一初探。

二战时期,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与苏联红军曾联合抗击过德国法西斯,但此间两军也发生过一些纠葛。战后初期,苏联对南斯拉夫政策,因有损于南斯拉夫主权利益,因而遭到了南人民的坚决抵制。为此,1948年6月,由莫斯科操纵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作出了将南共开除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错误决定。从此,苏南关系破裂^②。

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后,遭受了来自苏联东欧国家对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强大压力。铁托以其特有的精力和注重实效的态度来应付这一新处境。在国内,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人民不挨饿,保证本国经济发展不因与苏联东欧停止了贸易而遭破坏。为此,在对外交往中,他不得不与欧美国家建立关系。他知道这“对南斯拉夫的安全和繁荣昌盛都是必要的”^③,因而,迅速开始了跟西方的贸易对话^④。通过努力,“他获得了规模相

当大的西方援助。”援助项目大部分来自美国,英国也作了重大援助^⑤。除接受外援,铁托认识到:南斯拉夫还需要寻找朋友和同盟者以改变自己的孤立地位。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首先是改善周边国际环境。1954年,同希腊、土耳其三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从而“使南斯拉夫南部边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全”^⑥。与此同时,又通过谈判解决了北部南意之间的领土纠纷,与意大利的关系迅速改善,“终于使之成为南斯拉夫最有力的贸易伙伴之一”^⑦。其次是筹划开展不结盟运动。为联合广大亚非国家,从1950年起铁托就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有关国家集团提出倡议,开展不结盟运动^⑧,结果得到许多亚非国家尤其是埃及纳赛尔和印度尼西亚赫鲁的欢迎与大力支持。他们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成功地使亚非29个国家聚集到一起,并确定了后来不结盟运动所接受的基本原则^⑨。南斯拉夫国际威望因此得以显著提高。铁托在外交上的成就,无疑是“他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权威的成功挑战”^⑩。

在南斯拉夫卓有成效地逐步走上复兴之路的同时,50年代初的苏联,却“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不论是在对外政策,还是在对内政策上都是如此”^⑪。就其对南斯拉夫的孤立、封锁政策而言,“对

苏联本身也是有害的”^⑫。因此,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新领导开始检讨过去的内外政策。根据这一精神,苏联最高领导层决定:要成功地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就必须尽快实现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⑬。为此,1953年5月经苏联政府倡议,苏南两国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互派了大使^⑭。

当然,在与南斯拉夫逐步恢复关系问题上,苏共中央高层领导意见也不是一致的。反对派认为:“南斯拉夫已倒退到资本主义,我们怎么能同他们恢复关系呢?他们的经济已被美国垄断资本吞没;私有财产已经恢复,私人银行已建立起来。”^⑮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态度特别强硬,“反对同南斯拉夫缓和紧张气氛的任何尝试”。他们坚持认为:“南斯拉夫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⑯他们反对和解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直接卷入过1948年冲突”^⑰。换言之,当年他们曾同斯大林一起提出过苏联要让南斯拉夫臣服的侵略政策^⑱。所以,现在他们一个个都“不肯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旧立场上稍微移动一步”^⑲。

针对莫洛托夫等人的“顽固立场”,赫鲁晓夫认为,必须用自己的论据来驳斥顽固派论据^⑳。为此,他向苏共中央建议:组织一个由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由他们客观地分析一切有关的因素,然后决定南斯拉夫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㉑。于是,1954年初,经赫鲁晓夫提议,成立了以《真理报》总编辑、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家谢皮洛夫为首的研究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经彻底调查,给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结论是:没有理由把南斯拉夫看成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其农业生产中存在私有制,但也存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银行、商业和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掌握,而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专政。因此,南斯拉夫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㉒。

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一经确认,“斯大林据以在两国间制造争论的基础就不再有效,反对同南斯拉夫和解的论点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㉓鉴于1953年6月14日铁托在《关于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声明》中发表的“互换大使并不一定意味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或两国关系的改进,因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也会互换外交官员”的谈话^㉔,赫鲁晓夫感到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以改善两国关系。

1954年6月22日,苏共中央给南共联盟中央

发来了1948年中断关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进关系。8月11日,铁托回信表示:“有鉴于痛苦的经验,光发表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声明还不够,还要有事实。”^㉕为此,同年10月20日《真理报》就贝尔格莱德解放10周年发表文章,一改过去认为南斯拉夫是“军事法西斯专政国家”的指责,赞扬苏南人民之间存在着“用鲜血凝成的”友谊^㉖。11月28日,南斯拉夫驻苏大使馆为纪念独立日举行招待会,“苏联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㉗。鉴于日渐形成的友好氛围,怎样同铁托直接接触才是最佳方式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强硬派提出,应当要求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来谈判,但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建议,而“赞成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姿态,到贝尔格莱德进行访问”^㉘。他解释说:“第一,我不相信他们会接受邀请。这会显得是他们恭恭敬敬地来乞求我们;第二,是我们主动断绝了同他们的关系;是我们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就公开攻击了他们。因此,应该由我们采取主动来结束分裂;第三,我们是大国、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享有崇高的权威和威望。万一南斯拉夫人到我们领土上来会见我们而又不能达成一项协议的话,他们要冒很大的风险。”^㉙主动与南接触的方式确定后,赫鲁晓夫向铁托提出了访问建议,后者表示:“同意接待”^㉚。1955年5月14日,莫斯科发表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即将亲自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公报。公报称:“基于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两国政府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晤。”^㉛次日,铁托在普拉发表谈话,对不久举行的会谈“表示欢迎”^㉜。不过,当时铁托对于苏南修好也不是毫无顾虑。他主要是“担心由此会影响他同西方国家的关系”^㉝。故此,他预先向西方国家及希腊和土耳其的大使们通报了苏联领导人即将来访,同时极为坚决地保证:“南苏会谈决不影响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㉞。鉴于此,《真理报》在5月18日承认两国“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在理解上有重大分歧”的同时强调指出,同苏联恢复正常化关系,“决非,并且也不可能意味着南斯拉夫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恶化”。重要之点是,“苏联人民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是存在着进行广泛和全面合作的坚实基础的。”苏方显然愿意将意识形态问题搁置不谈的意图,得到了贝尔格莱德方面的称赞,铁托总统欢迎这一“勇敢的决定”,说它将使这次访问成为近来苏联一系列行动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行动。”^㉟

1955年5月26日,赫鲁晓夫率领由苏联部长

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外贸部副部长库米金等组成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举行会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仍担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未能同行。

由于多年来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受到巨大困难和压力,南共领导对苏共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存在戒心,对苏联新领导人的诚意也有所怀疑,因而在机场,苏联代表团虽受到了南方“应有的一切礼遇”。但是,“看不到有任何兄弟般的感情”^③。在欢迎仪式上,赫鲁晓夫宣读了一份由苏共中央领导集体草拟的负荆请罪式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承认,苏方对过去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一切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决心要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他表示相信,“在苏南关系中笼罩阴影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愿意尽力消除”阻碍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阻碍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巩固的一切障碍^④。他说,他对南斯拉夫要同西方和东方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愿望表示“完全理解”,相信苏南之间友谊和联系的加强,“将有助于改善所有国家(不问它们社会制度如何)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巩固普遍和平。”如果两国领导人不尽一切可能来求得苏南之间的互相谅解,那么就是没有对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⑤。

当赫鲁晓夫宣读上述《声明》时,铁托总统作为东道主“脸上毫无笑容,表情严峻”^⑥。对赫鲁晓夫等来访并未致欢迎词,只对客人说:“你看,我们用不着把你的讲演译出来,在场的人都懂俄语。”^⑦事实上,并非所有在场的南斯拉夫人都懂俄语。所以,赫鲁晓夫对于访问一开始受到如此冷淡接待,“有些失望”^⑧。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如前已述,由于南共对苏共存在戒心与疑虑,加之赫鲁晓夫又不承认斯大林对苏南关系恶化应负的责任,相反“却试图设法使斯大林免受南斯拉夫领导人攻击”^⑨,所以,双边会谈“气氛非常紧张”,“常常濒于破裂”。赫鲁晓夫决心要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共产党之间重建亲密关系——就是“要使南斯拉夫再度加入到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集团中去”。铁托则绝不愿意这样。他“只希望同苏联恢复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那种政府关系。”^⑩因两国领导人会谈出发点不一,所以双方事先为会谈结束准备的宣言草案差别甚大,无法调和。铁托态度非常坚决,寸步不让。赫

鲁晓夫最后只好撤回自己的草案,同意以南方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定宣言。结果,在6月2日,铁托和布尔加宁分别代表本国签署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宣言》(即《贝尔格莱德宣言》)。

《贝尔格莱德宣言》除规定“全面恢复1948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外^⑪,明确规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九项原则。其重要之点是:(1)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的平等地位;(2)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论其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的不同;(3)互相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因为国内的政治结构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形式问题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4)发展双边和国际经济合作;(5)停止任何形式的宣传、误传及其他散布互不信任和以各种方式妨碍创造建设性国际合作及国家间和平共处气氛的行动;(6)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在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国的企图等^⑫。苏联代表团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后,于6月3日飞离贝尔格莱德去保加利亚。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的访问活动,至此“顺利地结束”^⑬。

二

赫鲁晓夫访南尤其是两国政府签署的《贝尔格莱德宣言》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⑭。印度总理尼赫鲁首先作出反应,他对苏联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访问表示欢迎。6月3日至4日,希腊外长斯特凡诺普洛斯、英国外交部官方发言人、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等分别就此事作出了积极肯定评价^⑮。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对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说:“我祝贺铁托,他的原则取得了胜利!”^⑯在南斯拉夫,南共领导对会谈结果流露出了“恰如其份的高兴”^⑰。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虽基本接受了《宣言》,但他们对《宣言》内容“并不满意”^⑱,认为《宣言》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⑲。他们之所以在上面签字,是“因为他们不想两手空空回莫斯科”^⑳。显而易见,苏联与其他许多国家对《宣言》的反应大相径庭。那么,怎样全面、客观地评价赫鲁晓夫访南以及两国间所签署的《宣言》呢?笔者认为,赫鲁晓夫的“勇敢”行动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赫鲁晓夫访南对南斯拉夫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南斯拉夫通过《宣言》,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⑤4}。《宣言》所规定的:社会制度差别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这是铁托生平事业中最大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使苏联不仅承认了南斯拉夫的独立权利,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内一切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一原则。这就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之上并拥有最高权威这一理论从此告终^{⑤5}。

第二,苏联领导人在《宣言》中第一次“以明确和公开的方式接受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⑤6}。这不仅对苏南两国相互关系,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⑤7}。尽管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仍时有表现,但苏联领导人亲自访南登门道歉这件事本身意味深长。它是对苏联一个时期以来对待一个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错误态度的一种批评和自省。正因为如此,《宣言》被南斯拉夫人看作是“某种社会主义的‘大宪章’”^{⑤8}。

第三,南斯拉夫从苏南关系改善中得到了诸多实惠。首先,铁托要求赫鲁晓夫解散“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在翌年(1956)年4月17日实现了;他要求与苏联的卫星国实行经济合作,这也恢复了;他要求遣返1948年以来一直未让离开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苏方亦作了让步^{⑤9}。其次,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和财政协定^{⑥0},使苏南两国间的贸易有了广泛发展。这些协定包括:“在南斯拉夫建设价值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工业企业,总额五千四百万美元的商品贷款、科学和技术合作,价值三千万美元的黄金或外汇的贷款,原子能方面的合作等。除此之外,还签订了有关建设铝厂和化肥厂的专门协定等等。”^{⑥1}最后,莫斯科还向南斯拉夫做了一个友好姿态:一笔勾销南1948年以前所欠苏联的债务,“总额为九千万美元”^{⑥2}。铁托在评述此事时说:“这不是某种‘战争’赔偿,而是他们体谅我们1948年以后的困难,勾销了这一大笔数目债务,使我们今天不欠他们的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姿态,在我看来,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十分重要。”^{⑥3}因此,铁托1956年2月11日在《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表示,他对于两国关系的“逐渐和不断的改善感到满意”^{⑥4}。

第四,苏南关系改善,促进了南斯拉夫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发展。1956年至1960年间,南斯拉夫先后与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

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恢复、建立或发展了外交关系^{⑥5}。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正常化,“丝毫未影响”南斯拉夫与欧美国家业已存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因为,这种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有其植根基础,即“在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上实行互利”^{⑥6}。曾两度出任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的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就此评论道:“如果改善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结果是使我们同西方和美国的的关系恶化,那么这种改善就很不值得,就是于我们有害的。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具有根本性和持久的意义的是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同一方改善关系来搞坏同另一方的关系。”^{⑥7}这一评论说明:苏南和解之后的南斯拉夫外交,已经完全走上了独立、自主、灵活务实的轨道。

(二)赫鲁晓夫访南使苏联的收获亦“彰明较著”^{⑥8}。

其一,苏联承诺南斯拉夫可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其策略上的一步棋。在他正逐步开展的非斯大林化方案中,南斯拉夫和铁托起着重要的作用。非斯大林化与同铁托和解,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件事上,他感到重要的是消灭他在莫斯科的内政对手。因此,在这场游戏中,铁托“成了赫鲁晓夫最重要的同盟者和帮手”^{⑥9}。

其二,由于摒弃了欺压邻邦小国的政策,苏联的道义地位得到了改善^{⑦0}。前已述及,南斯拉夫同印度、埃及和其他中立国关系密切,因此,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对苏联同亚洲、非洲不结盟国家的合作政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资本。在这方面,苏联显然巧妙地比西方人占了上风^{⑦1}。赫鲁晓夫访南结束后,又对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新德里成功地抬高了贝尔格莱德之行成果的价位,因为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有助于说明:“苏联对印度以及对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的政策朝好的方向发生变化。”^{⑦2}英国学者分析认为,铁托与万隆会议参加国建立关系,“很可能是促使苏联同南斯拉夫重新和好的因素之一;因为从苏联的观点看,它的行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赢得不结盟国家的好感,而弥合同南斯拉夫之间的裂痕,无疑被它们视为安抚人心的一个重大步骤。”^{⑦3}这一推论,看来是有根据的。

其三,当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贝尔格莱德宣言》的一些原则问题上满足了铁托之后,苏联也获得了南斯拉夫对其外交政策的大力支持。此项政策涉

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要求获得联合国席位问题;限制军备问题;以及在遵照有关人民的意愿和合法权利的情况下解决德国和台湾的问题^⑦。

(三)赫鲁晓夫访南萌生了对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多样性认识

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之余,曾应邀参加了由南斯拉夫领导人安排的一次去各地访问的旅行^⑧。赫鲁晓夫因而“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南斯拉夫在经济方面采取的许多新的、不寻常的措施”^⑨。他对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发展旅游、轻工业生产管理等方面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深感兴趣”^⑩。他说,虽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大胆试验,“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功的”^⑪。但是,“不能否定南斯拉夫人民在自己的道路上所取得的一切,不能局限于相互指责和责备,任何人也不能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把别人的经验说成是修正主义或是引进资本主义。”^⑫因为,南斯拉夫的实践已经证明:“建设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千篇一律的样板是不存在的。”^⑬所以,“不应该给世界上所有国家造出一个统一的模型、统一的模式,并由此立场出发,把不能套进这一统一模式的做法当作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谴责。”^⑭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新经济措施,“至少是对苏联经济管理作出有益贡献的一个开端,否认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⑮。他建议,苏南两国“深入地研究彼此的经验,学习那些被证明是有用的经验,是有益处的。”但是,这种相互学习必须遵循“自愿”原则^⑯。应当承认,赫鲁晓夫访南期间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多样性的认识,不仅十分正确,而且也难能可贵——这是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建设思维中的闪光点。

(四)赫鲁晓夫访南导致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独立意识增强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F.沃尔在评论苏南重建友好关系时说:“这一行动必然会对其他共产党国家,特别对那些有民族主义传统倾向的国家产生影响;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则可能会感到,对莫斯科无须那么卑躬屈膝。”^⑰这一评论符合实际,苏南和解的重要性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它代表着苏联内部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侧面,而这一运动作为东欧其他共产党政权即将实行自由化并减少对莫斯科依赖程度的信号,而赢得欢呼^⑱。因此,在赫鲁晓夫访南之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及它那种甚至为美国和西方大国所

容忍和支持的不结盟共产主义,“成了东欧所有那些想摆脱苏联霸权统治的力量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榜样”^⑲。这些国家纷纷为其国内所谓“铁托分子”、“英美间谍”、“民族主义”分子恢复名誉,结果使得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政权赖以支撑的意识形态结构在内部崩溃了,因为这些政权一方面在为“铁托分子”平反;另一方面,又必须为其过去反铁托主义的清洗审判和处决进行辩解。加之这些国家经济不景气等因素,从而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况。

1956年波、匈事件相继发生,使苏联领导人望而生畏,他们向卫星国发出秘密指示,警告他们不要步南斯拉夫人的后尘,并且重申,莫斯科有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高于别人的地位^⑳。基于这一认识,赫鲁晓夫对1956年“十月的波兰春天”曾拟以武力进行干预,但未成功。最后,只好默认了波兰改革派的独立要求^㉑。但在稍后的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苏军则毫不留情地用武力镇压了那里的人民革命。这表明:“独立也适用于南斯拉夫以外的国家这个原则纯属幻想。”^㉒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贝尔格莱德宣言》成为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后果最严重的政治文件之一。”^㉓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55年赫鲁晓夫同铁托和解,不仅对苏南两国政治经济,而且对当代国际共运、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充分认识赫鲁晓夫访南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应指出:赫鲁晓夫后来并未完全按照《宣言》的有关规定去处理两国关系。1956年,赫鲁晓夫又公开要求南斯拉夫重返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问题上,“协调是必要的”^㉔。但南斯拉夫却一如既往,在外交政策上坚持自己“特殊独立的立场”,并“自行其是”^㉕。从而在苏南之间“留下了一个没有扑灭的火星。”^㉖这也正是1955年以后,两国关系“始终在冷淡与有分寸的友好之间摇摆”^㉗的重要原因。联系上述1956年赫鲁晓夫对待波、匈事件的态度,以及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干涉其改革的事件,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与其前任斯大林和后继者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外交和实力政策方面,绝没有用不同的范畴进行思考,即必须按照他的国家和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处理一切国际事务,赫鲁晓夫仅仅是在方法和立论的主观情绪方面有别于他的前后任而已。

注 释:

① 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上海译文

- 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70页。
- ② ②4 ②8 ②5 ②7 斯蒂芬·克利索德编:《1939—1973年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9—136 453 139 144 144页。
- ③ ④ ⑤ ⑥ ⑦ ⑩ ③9 ⑤5 ⑤9 ⑧9 ⑨4 菲利斯·奥蒂:《铁托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300 297 298 299 299 306 301 301 301 303页。
- ⑧ ⑨ ⑬ ⑤6 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62 362 358 358页。
- ⑪ ⑫ 铁托:《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19,181页。
- ⑭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 12卷上册,东方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48页。
-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第 543 543 543 543—544 544 544 544页。
-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71 171 171 171—172 174 173 173 344 170 173 173页。
-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联书店 1980年版,第 27 8 9 9 9 9 64 11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26 145 167 167—168 168 170 175 175—176页。
- ㉔ ㉕ 罗伊·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8—59 59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45 545 545 545—546 546 549页注①。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英《泰晤士报》,1955年 5月 16日。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言论》第 4集(195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年版,第 236 237 1239页。
- ㉔ ㉕ “不过,后来赫鲁晓夫承认,他正是在那里,在南斯拉夫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多么虚伪,意识到不该把过去的一切违法行为统统推到贝利亚等人头上。”见《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第 59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苏]A. A. 阿赫塔姆江等编:《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 131页。
- ㉔ ㉕ 《贝尔格莱德宣言》(1955年 6月 2日),载《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48页。
- ㉔ ㉕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现代史研究所编:《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4—315页;《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20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苏]《真理报》1955年 6月 3日;《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第 131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铁托选集(1952—1960年)》,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84 108 184—185 177—178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86 92 92 88 88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47 554 556 562 555 552—553 552页。
-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版,第 56—57 56 58页。
- ㉔ ㉕ 拙著:《赫鲁晓夫与 1956年“十月的波兰春天”》,《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 10期。

(责任编辑 吴友法)

Khrushchev's Visit to Yugoslavia in 1955 and Its Influence

Li Hua

(Nantong Normal College, Nantong 226007, China)

Author Li Hua(1962-),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Nantong Normal College, majoring in world history.

Abstract Khrushchev's visit to Yugoslavia in 1955 was a grea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Yugoslavia relationship after World War II, having far-reaching influence. 1. This visit to Yugoslavia is of gre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2. The visit led Khrushchev to the belief that socialism could be realized in a great diversity of forms; 3. This visit aroused a stronger desire for independence i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countries of East Europe.

Keywords 1955; Khrushchev; visit; Yugoslavia; Tito